

# 论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

关贵海

**【摘要】** 本文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迁进行了分析,并把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变迁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革命时期”、未成功的转折时期、对国家思想的探索时期。作者认为,俄罗斯意识形态终会形成,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

**【关键词】** 俄罗斯 社会转型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从社会主义苏联到当代新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不仅涉及到了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也触动了这些转轨领域的深层次背景,即政治文化,其中以意识形态为标志的社会思潮的变迁,是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

## 一、分析的出发点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似乎非意识形态化在冷战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该观点有一定道理,是因为:第一,在西方世界内部有更深程度的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二,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让位于实用主义和互动的倾向。但是,因此就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其意义,则为时尚早,因为,第一,民族主义思潮在四处兴风作浪,若加上宗教原教旨主义,则更是势不可挡,阿富汗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第二,自以为获得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面胜利的西方自由主义,同样面临着来自新左派和保守主义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挑战。

出现此局面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宽泛。在现代社会里,意识形态通常有四类: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且由于相互渗透和影响,常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却创建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出现类似“保守的自由主义”等现象。

此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三种特征:保守的(维护现存秩序)、革命的(以激进的方式对现秩序进行根本性变革)、演进的(通过秩序内改革逐渐转换现秩序)。不要以为这三大要素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如革命的与社会主义匹配。自由主义同样有革命要素,而且不仅仅是在其形成和确立的初期,例如,在中东欧发生的“温和革命”。总之,革命的脉搏可能在保守主义者那里捉到,而保守的性质也可能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上风。

不过,俄罗斯与西方还是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是社会性的,而在俄罗斯是国家性的。尽管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了不能有任何意识形态独统国家,但由于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更由于历史上利用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全民动员实现过若干重大历史任务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不论什么政权在俄罗斯当道,都不得不抛出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出现之前,俄罗斯就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同时,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又离不开正式的、官方的认可和

强大的国家机器、国家权威的强化。普京上台、其强国思想及其集权措施的凸现,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 二、俄罗斯意识形态转型的过程

自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失去主导意识形态以后,俄罗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由主义思潮一手遮天的“文化革命”时期(1991 - 1993)。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改革是在社会和国家“非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非共产主义化的旗帜下发生的。但是,改革没有取得提高经济效率的预期成绩,却有意识地切断了共产主义体制复苏的道路,即大规模地将国有财产私有化。

在此阶段,尽管自由主义在形式上并没有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当权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把它看成是唯一正确的学说,哪怕拥护它的人远非多数。换言之,俄罗斯自由主义少数派自负地代表国家表态,企图把自由主义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强迫社会各阶层接受。俄罗斯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缺陷,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和历史依据。因此,它主张更替俄罗斯文明。所以,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成了文化种族主义的传播者,因为在它看来,不仅俄罗斯文明,也包括其他文明,均不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西方化,确切地讲就是美国化,是俄罗斯自由主义的鲜明特征。

从戈尔巴乔夫时代起,自由主义就对俄苏国家的作用进行了无情批判。批判的矛头并不主要是针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是针对国家政权的牢固地位。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职能,即最大限度弱化,使之仅成为强大市场的一个附属品,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顽固的预先决定论,即容不得任何其他选择:只有西方文明的道路才能引向真正进步,只有盖达尔的改革才是最正确的。

应该说,在俄罗斯民主派阵营内,还有其他意识形态倾向,同伪自由主义并存,如亚夫林斯基所代表的思想。他们也承认民主和市场的不可替代,但同时又强调没有强大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市场。在他们看来,改革首先就是建立法制国家,确立法律高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等人也曾经属于当权者,但他们从未成为过自由主义者,尽管也曾提出过有关开放社会和民主等建议。相反,由于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的影响,他们事实上剥夺了自由主义者修正自己的学说并使之国家化的机会。

相对而言,在第一阶段,自由主义比其他思潮和力量更有效和独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叶利钦对该倾向的支持和巨大的新闻资源支撑之外,还可以用以下几个民族心理方面的因素加以解释。

第一,自由主义是拿现实的资本主义“天堂”做标本,因此,在缺乏理性、具有轻信倾向的俄罗斯民众面前,其学说具有最初的吸引力和新鲜感。相比之下,在俄罗斯已经遭受失败的、空泛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神话般的俄罗斯民族伟大形象,则略嫌抽象和渺茫。

第二,俄罗斯民族具有相当的忍耐力和宽容心,对规模宏大但前景诱人的自由主义改革,采取了宽宏大量甚至是称许的态度。

第三,自由主义思潮把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非建设性本性释放出来。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是摆脱了严厉的外部控制的成熟公民社会,即自由但有责任感的公民构成的社会。而在俄罗斯,外部控制虽已被抛弃,但却没有出现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无任何责任感的为所欲为。90年代初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形态,几乎可以表述为以国家名义容许的社会经济全面混乱。

更意味的是,当鼓吹自由主义学说的政治家们在遇到了来自政治对手的激烈反抗时,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思路上来,即依靠“铁腕”、借助父权传统,也就是叶利钦的专权。

还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者寻求“铁腕”的做法,恰恰印证了革命的一般规律:在有目的地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非建设性阶段过后,必然代之以国家机器的恢复和巩固。因此,任何革命的最终结果,

却是建立比已经被摧毁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93年底以新宪法为标志的叶利钦全面控制国家的现象,标志着自由主义革命潜力的枯竭和保守地维护、改良新制度的开端。

### 第二阶段是未成功的转折时期(1994—1995)。

对自由主义学说而言,叶利钦使用武力废除苏维埃式议会体制,既是胜利,也是失败。说是胜利,容易理解;说是失败,略显费解。在笔者看来,其失败有三重标志:一是用暴力手段实现变革,对俄罗斯自由主义形象是一种沉重打击,至少在西方社会眼里如此;二是在随之而来的议会选举中,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者和挺过来了的左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三是叶利钦给1994年国情咨文定了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爱听的题目,“关于巩固俄罗斯国家”。

事实上,在此后的时期里,大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措辞成为俄罗斯高层官员或政治家的言论主调。相应地,俄罗斯对外政策日趋强硬,特别强调自己在前苏联空间内的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调节被强化;发生了具有明显反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人事变更;第一次车臣战争当属该系列行为的高潮。

所有这些举措,事实上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政治思维从革命性向稳定性的转变。如果说在此前主要解决的是“谁征服谁”的问题的话,那么,此时的主要任务则是集中和巩固政权、争取制度的合法性、统一社会力量、恢复经济增长。这在本质上无疑是对俄罗斯国家传统的主体地位的恢复。

此类实践上的转变,与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密切相关。明确否定国家作用、否认本民族独特性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不大可能被用来支撑“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治方针,因此,对它的扬弃是必然的。但同时,俄罗斯政治上层又不会全面彻底地放弃自由主义,一是因为它体现着对1991年所谓“8月革命”的继承性,二是因为它是俄罗斯政权在西方世界眼里拥有合法性的关键要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俄罗斯寻找着新的意识形态,于是出现了民主和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交错的局面,被人们称为“政权党”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纲领,就是最好的例子。

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径方面的变化,即对国家作用的重新强调,不仅是由于政权在从革命性向稳定性转变,也与俄罗斯社会的大众意识有关。体尝过“自由的市场”和国家赋予的民主的“甜头”,大众意识本能地摆向了对苏联集权体制的怀念。起码当时保证了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秩序。于是,从1994年起,整顿秩序成为俄罗斯政治家吸引选民的一个重要口号,而秩序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与强化国家作用几乎就是同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者和政权本身都没有提出什么新鲜内容,而是面不改色地从左翼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反对派那里接过了某些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口号。“俄罗斯是一个政治民族”就是这样的口号之一。该提法是从西方舶来的,针对的是俄罗斯身份证的“第五项”,即“民族”。该口号的目的是要证明,你是俄罗斯族还是鞑靼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俄罗斯公民。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有意义的口号,同样因不符合俄罗斯的实际而不了了之,因为非俄罗斯民族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唤醒的、对自己地位的敏感态度,与俄罗斯族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是水火不容,也至少是相去甚远的。

另一个政治高调,即社会和睦条约,也没有唱到底,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只想着强化自己的地位,却不愿意承担起任何责任。

车臣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反映了加强国家作用的趋势,同时从新闻媒体对政权的批评程度来看,又表明没有国家对宣传舆论空间的控制,就不可能把官方的强国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变成大众意识的主导。而居少数的自由主义者们则死守住舆论阵地,誓死不让国家作用被顺利强化,指责自由派媒体的“反国家”、“反人民”主要也是指这方面的意思。

也正是清楚意识到自己对自由派媒体和资本的依赖,叶利钦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最终选择了以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而抛弃了以索斯科维茨为代表的国家主义。

### 第三阶段:对国家思想的探索(1996-2000)

在获得连任以后,叶利钦立即着手炮制国家意识形态。总统选举清楚表明,俄罗斯社会在思想上已经严重分裂。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两个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重的竞争对手——叶利钦和久加诺夫——那里,却没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的只是大杂烩,只是表明要反对谁,也就是说缺乏建设性和战略性思想。叶利钦的胜出与其说是其思想的胜利,不如说是其权力资源的胜利。

然而,叶利钦的任务并不轻松。他面对的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体系已经被摧毁,传统的行为准则被歪曲了的、分裂的社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重新整合这个社会,否则,任何美好的改革设想、改善生活的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为此,叶利钦做过一系列尝试,如提高东正教的威望、恢复沙皇的名誉等等。当然,自由主义媒体立即对这些尝试进行了抨击,因此,也是不了了之。

虽然国家主义倾向在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背景下被强化,并在俄罗斯社会获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强国思想已经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全面、彻底的支持,也不能说他完全背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因为,第一,他的思想体系没有最终形成;第二,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国家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在观察着普京能否突出他们自己主张的那一方案;第三,他在强化国家机器方面的许多重大举措,并没有超出革命后稳定政权的框架。

## 三、几点结论

虽然俄罗斯社会在思想上的分裂,没有因为普京的出现而消除,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思想上的共同倾向:一是绝大多数人对当今状况的不满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怀念;二是改变当今不满状况的途径是渐进的改革;三是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不能干涉个人生活,要保障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

可以预见,这些共同倾向将成为俄罗斯新型意识形态构造的基础。

意识形态新构造的主轴将是俄罗斯的传统,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苏联时期以及当代俄罗斯的思想成就。当然,主要成分将是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再加上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某些原则和左翼保守主义的某些实质性主张。

具体地讲,从自由主义的“宝囊”中可以借鉴的、甚至已经深入到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的价值观包括:政治和经济自由原则、分权思想、多党制原则、媒体独立的观念、自由选举意识和法制国家思想等。

从左翼反对派那里能够汲取的是,家长式作风、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张、以及让人们感到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息息相关的想法。许多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俄罗斯人实质上需要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与上述三种观念相联的一种信仰。

能兼容并包当然不错,但是,大多数自由主义媒体将会阻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左翼思潮在大众意识中的传输。因此,新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将不会平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俄罗斯新的意识形态顺产,它也更多是一种替代品,而已经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同时仍具有意识形态的某些基本功能:确定指针、赋予政权合法性、动员社会力量、规定社会准则、整合社会关系。

(责任编辑 郝宇青)